温朝钟和黔江庚戌起义

王绍明　整理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大路坝，不仅有风景幽美的地震湖泊——小南海，而且还为我国近代历史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光辉篇章就是震惊清庭的黔江庚戌起义，而同盟会会员、黔江土家族青年温朝钟则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加入同盟会

温朝钟，生于一八七八年，字静澄，号果斋，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后坝乡人。一九〇四年，即光绪三十年考取黔江县学未去。一九〇六年他到成都，改名温而理，考入四川省立师范学堂。这时，他遇到了黔江同乡，刚从日本留学归来从事革命活动的同盟会会员程芝轩，经程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放弃学业，遍游四川、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广交革命志士，在汉口新军学造炸弹，学习击剑，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

成立风俗改良会

温朝钟回到黔江以后，联络黔江、湖北省咸丰两县同志，进行革命宣传，揭露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实行民族压迫的罪行，并倡导成立风俗改良会，提倡“练习武艺，团结救国；不吸鸦片，强种保国；妇女放足，发挥力量；不当洋奴，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愤自强。”他还深入各乡里，宣讲革命道理，得到黔、咸两县土家族人民的支持，参加风俗改良会的达一万余人。

创建武装团体“铁血英雄联谊会”

温朝钟建立风俗改良会，首先得到其亲戚——湖北咸丰县蛇盘溪乡绅、土家族黄玉山和黔江县的王克明、谈茂材等人的支持，他们都倾其家产，以资相助，暗中购置武器。他与王克明、黄玉山、谈茂材、王云笠、王斐然等在黔江、咸丰两县，散发邹容的《革命军》万余册，又在大路坝、凤池山，以及彭水县的李家营等地设立秘密联络点，“进邑不入其会者，盖益甚少矣”，革命力量迅速扩大，就将风俗改良会改为“川鄂湘黔铁血英雄联谊会”，并提出“义联英俊，协和万帮，推翻满清，打倒列强，复兴中华，实行共和”的政治主张。

准备武装起义

温朝钟在川鄂边境的革命活动，使清朝统治者极度恐慌。一九一〇年，即宣统二年，湖北施鹤道发布告示，通辑温、王、黄等人。温朝钟便改名孔德华，到四川江津、永川等地访问同盟会战友，商讨起义事宜。此时，正是夏历庚戌九、十月间，人们纷纷议论一九〇五年签订的日俄侵占东北的协定，加紧分割我国东北的罪行。加之“黔江县令王炽昌又藉名苛征”，人民的反抗怒火一触即发。各地同盟会员领导的武装起义不断传来，友人还赋诗鼓励他：“世界昏沉不计年，风雷雨雪尽烽烟。谁能逐鹿行千里，我欲屠龙下九渊。提起环球烘白日，掀翻苍海洗青天。拼将一箸成孤注，

免得情思恨缕牵。”温朝钟受到极大鼓舞，也和诗表示，“瀛海（今黔江小南海）劫灰犹化尘，神州狮睡谁为春。龙将沼池云先起，虎未啸林风已生。渔父尚轻亡国奴，汉儿甘作醉乡民。皇天有命诛残暴，谁是攀龙附凤人？”

凤池山起义

庚戌年冬月下旬，温朝钟、黄玉山、王克明等到凤池山商讨起义计划，不料事机不密，被豪绅温百川探知，温朝钟便于一九一〇年一月三日，即庚戌年腊月初七，聚集身边的二百多人，宣布起义。起义军兵分两路向黔江县城进发。一路由斐培元率队翻八面山，扬旗放炮，牵制官兵；一路由温朝钟亲自率领二百余人出大路坝，过中坝，直攻大垭口。官兵居高临下向起义军开炮，温朝钟带小部队抄后路突然袭击，攻下了黔江县城。起义军占领县城后，捣毁了天主堂，打开了监狱，释放了犯人，没收了官府财物。为了扩大队伍，聚集力量，温朝钟就到附近乡里召集群众，发表演说，揭露“专制政体之残暴与各处官吏之贪污，倾诉人民之苦楚”，“闻者泪下”，响应者约七、八千人。温朝钟在两会坝场上把起义队伍整编为“国民军”，公推温朝钟为国民军总司令，王克明为总长，黄玉山为后勤长官。这时有人劝温朝钟成立军政府，固守黔江县城，告示四方，等待响应。温朝钟回答说：“县城很小，又缺粮草，死守不是上策。仅一县城就设立政府以称大，也不是我们的目的。”起义军在两会坝整编后，便撤离县城，回到大路坝号召群众，补充军械，再攻打彭水，出涪陵．沿长江发展，以配合全国起义。

起义军惨遭镇压

这支活跃在川鄂边的土家族起义军，使清朝统治者极为惊恐，当起义军攻下黔江县城时，清政府急电令川鄂湘黔四省督抚“合力兜剿”。腊月十二日，起义军行至上沙坝时，遭到酉阳协防军和黔江团丁的伏击。四省官军重重合围、追击。腊月二十七日，起义军被围困在湖北咸丰县的飞龙寺，有人劝温朝钟隐蔽起来，等待时机，再行起义。温回答说，“首其事者当其难，怎能逃避呢？”二十八日拂晓，飞龙寺被攻破，温朝钟被清军砍死，时年三十二岁。

土家人民的怀念

温朝钟领导的起义，是一次反清反帝的革命，在川鄂边揭开了反帝反清的序幕，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支前奏曲。川鄂边人民为纪念温朝钟、王克明、黄玉山等革命志士，湖北咸丰县城一条街被命名为“朝钟路”，黔江县城范公祠内曾立有温朝钟的牌位，并有群众献的“铁血英雄”匾额。许多文人学士纷纷著书撰文，把温朝钟的事迹编成唱词，并为他立传，广为散发，至今还在川鄂边土家人民中流传。

〔转载《四川民族》八五年第三期〕

贺老总四次到我家

王绍明收集整理

在海拔一千一百多公尺的四川省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水市乡，有一个古老的集镇，叫水车坪。从前有一条通衢大道经过这里，把鄂西、湘西和川东、黔南等地连接起来。许多客商云集这里，是有名的牲畜集散地。在这个场镇上世代居住着一位苗族老人，名叫石卓之，他有一男四女，家里以开客店为生，并经营骡马生意。一九六〇年六十九岁时，他讲述了贺龙青年时期四次来到他的店铺里和他结为知心好友的故事。下面是石卓之的讲述。

英俊潇洒的贺云卿

那是民国五年，即一九一六年的一个秋天，六个商人打扮的人来到水车坪，经打听之后来到我开设的店铺内住宿，领头的是一个年近二十岁的英俊青年。他身材魁梧，举止大方，头戴草帽，身着长衫，对人十分和气，后经他自己介绍，名叫贺云卿，家住湖南，一来想出来见见世面，二来想买点赚钱的东西或者马匹，好带回家赚点钱用。这次整整在我家住了十天，由于时间长了，他们托的事，我很快就帮他们办了，彼此十分亲密，一有空就坐下来闲谈，摆龙门阵，他有时还提到什么“惩治恶人”“除暴安民”等事情。贺云卿有一手好武艺，不时逗人玩耍，有时早上他洗完脸，手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伸，脚一跳，就把洗脸盆不偏不倚地放在屋檐上了，然后对其他人说“你们要洗脸就跳上去拿，不洗就算了”，常常搞得一些人捧腹大笑，左右为难。还有一次在闲谈时，我提到在湖北蛇盘溪做骡马生意时，被土匪抢劫的事，贺云卿对我说：“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是不足为怪的，特别是对一个做生意、有钱财的人来说，就更不为奇了。我也曾有过这样的遭遇。一次，路过湖北叫麻望排的地方，十多名土匪前来抢劫，我说，弟兄们，你们是要钱吗，这莫关系，拿去就行了，不过做你们这项买卖，单靠手里的几根掏火棍还不行，还要有几手才行。当时土匪认为我是讥讽他们，硬要逼我试试看，否则不光要钱财，还要我的命。我一不慌，二不忙，吩咐一人从路边搬来一块两寸多厚的大石块，面对着土匪，一掌击得粉碎。众土匪看得目瞪口呆，一个个悄悄地走了，我的钱财一点也没有受损失”。当时，我半信半疑地说道：“贺先生，你真有这样的本事吗？莫吹牛哟？”他放声大笑地说：“你不信吗？我来试试你看吧！”我顺手从墙上取下一块完整的火砖摆在地上，只见他手起声落，火砖被劈成几小块了，我们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结束了这场交谈。事隔几十年了，总觉得当时的贺云卿先生不是一般的生意人，他讲的话从未听说过，是现在才从中懂得了一些道理，他真是一位好人啊，至今还难以忘怀。

机智对付黔军

第二年，即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八月间的一个晚上，贺云卿一行四人又到了我家。他对我说：“这次我们的生意要改行，不做其他生意，专买骡马，我们家乡需要大

批骡马（编者注：是贺龙在桑植起义前的物资准备）。你是内行，还得麻烦你多帮忙。”于是我们就到彭水、贵州的沿河、务川，以及附近乡场购买。买好后就牵回来拴在场边的大皂角树下，集中喂养。在这期间，曾有人向黔军驻在两河口的一个姓徐的营长告密，说贺云卿带有武器，不是真正生意人。徐营长得知后，当即派部下龙保安前来查访，准备扣押。殊不知，龙保安会见贺云卿之后，被他的豪爽气魄和善断的言词所感化，不但不追问武器一事，而且还与贺云卿一起耍了两天。龙保安回去向上司汇报说：“他们没有枪枝，纯系生意人。”此事就这样结束了，后来他们共买了十几匹膘肥体壮的骡马回湖南去了。

起义受挫折

相隔一年多，约民国七年的一个深夜，贺云卿第三次来到我家，一行两人，只仓促地在我家住了一晚上。当晚，我备了酒菜，围坐在火坑边一起喝酒，一边摆谈。当时他好象有心事似的，性情也有些急躁。在我一再追问下，只对我说：“我在家乡造反，搞革命暴动，遇到不幸，亲人遭到杀害。”他还说：“我要到彭水、重庆，再到武汉、南昌、广州等地去看看形势。”

亲切的教诲

贺龙第四次到我家，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这我记得很清楚。贺龙率领红三军奉命征战川黔边，他从酉阳南腰界出发到我县马喇湖时，就写信并派出两个部下提前来告诉我，要我动员乡亲们不要跑，要在家等他。这次过路的全是身着便衣、脚穿草鞋的红军战士，千军万马，十分闹热。红

军一位首长先到我家，由于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和贺云卿有些相象，我就以为他就是贺云卿，就上前去喊了一声“贺云卿先生！”一位红军侦察员叫肖美成的连忙说：“这是师长，贺军长还在后面呢！他现在不叫贺云卿，而叫贺龙。是我们红三军的统帅！”接着便把贺龙的信交给了我。

第二天下午，贺军长确实来了，穿着完全不一样了，差点未认出来。在房檐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问我好。他进屋后和我坐在一条凳上摆谈，并随手送给我两包卷烟，他对我说：“我们是工农红军，是为穷人翻身，打土豪劣绅的。我本想拿点枪把你们这里的团防改变过来和我们一起闹革命，但想不到他们还拿枪抵挡我。抵挡是抵挡不住的，在我们家乡，群众叫我们“菜刀兵”。确实初期我们只有几个人，用柴火头包上红绸，用菜刀去缴了敌人的枪，到今天，我们的人枪不就很多了嘛。”听了贺龙这些话，我心里也好象明白了啥子似的。我一看贺龙军长周围并没有好多保护他的兵，就说：“贺先生，你当了军长了，为啥子不多带几个护兵呢？”这时贺龙指了指行进中的红军队伍对我说：“这些都是我的兵，还带护兵干啥。”

当天晚上，我专门备办了好酒，叫家人办了几样好菜，招待贺龙。当我的十四、五岁的女儿石琼仙端菜上桌时，我当即叫她退回灶房去，当时贺龙知道是我的女儿时，便对我说：“你莫要封建嘛！快叫女儿来我们一起吃，于是我们一家人与贺龙一起吃了一餐饭。还记得，马喇湖大恶霸地主莫耀堂被红军捉到李采之家时，莫家曾请与贺龙有过交情的族人贺兴顺（黔江火石垭人）来说情，要拿钱取人。当时贺龙绷着脸说：“你怎么走这个冤枉路啊！我若是图钱的话，还

捉他干什么呢？”并向在场的群众宣讲红军为穷人打富济贫，除暴安民的道理，而且还将大地主莫耀堂、李采之、周世禄、梁明欢等的财产分给劳苦大众，写了许多宣传标语。红军的行动在各族人民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贺龙将军在临走前的一天晚上，把我请到他的房间里，亲切地对我说：“我们明晨就要前去攻打彭水，你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我想了一会儿对他说：“我儿女还小，需要抚养，离不开。”贺龙同志看我不愿去，紧接着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教诲我说：“要教育好子女，好好送他们读书。现在不要积钱发家，以后革命胜利了，有饭吃有钱用。……”这一夜的长谈，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次日，天刚拂晓，贺龙将军就跨上战马，随着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往彭水方向去了。

解放初期，贺老总驻在重庆，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我曾给他写过一封信，向他问候。不久就收到了他的亲笔回信，他叫我到他那里去耍。因当时交通不便，没有去得成，后来连信也不知丢到那里去了，至今几十年了，但贺龙同志的音容笑貌和他的深情厚意仍铭记在心，将教育子孙后代永志不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贺龙与“红军树”

王绍明

在四川省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水市乡，有一个古老的集镇，叫水车坪，是有名的牲畜集散地。在这个场镇边，如今还有一棵已有二百多年的皂角树，它就是各族人民为纪念贺龙同志的光辉业绩而命名的“红军树”。

如今每当节假日，或者仲夏纳凉之时，这里的土家、苗族老人，就会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牵着孙子，来到这棵皂角树下，向子孙，向围坐在四周的青年们讲述着当年贺老总在这里拴骡马，要大家爱护树木的故事。

据这里居住的苗族老人石卓之生前回忆，那是民国五年，即一九一六年前后，正当贺云卿青春年少，满怀壮志，准备在家乡桑植、大庸一带造反，开展“护国反袁”武装暴动之时，他头戴竹笠，身着便装，曾三次经酉阳，路过水车坪，再到彭水等地购买骡马，住宿于水车坪石卓之开设的店铺之内，并将骡马拴于皂角树下，后来当了军长之后，又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率领红三军征战川黔边，攻打彭水县城，途经水车坪，夜宿水市场，又在这棵皂角树上拴过他的战马。最后一次贺龙军长离开这里时，一手牵着他的枣红马，一手指着这棵皂角树，对前来送行的乡亲们讲了保护树木的道理。他说：“毁树容易栽树难，如要毁这棵树只需几斧头就行了，但要培植这么大的树就要几十年，上百年了，

这棵树不能砍！一定留着有益处，比如说它可以涵养水源，保护土壤；可以供路人乘凉、歇憩，这多好啊！还可以造房屋，它的刺、它的果，都可以做药治病，为民解除疾苦……”

就因为这样，不管是在那毁林砍树的“大跃进”年代，还是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这里的人民都牢记贺龙同志的叮嘱，想方设法编造一些神奇的故事，去吓唬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终于将这棵宝贵的皂角树完好地保全下来了。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中共黔江县委、黔江县革命委员会决定，为了纪念红三军以及贺龙同志的光辉业绩，在这棵皂角树下，建立“红军革命纪念碑”。这里的人民出于对贺龙同志的怀念，捐资为贺龙同志竖立了“永垂不朽”的石碑一座，并正式将这棵皂角树更名为“红军树”。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列为县级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保护。

如今，这棵历尽沧桑的红军树，在当地各族人民的培育和爱护下虽然古老苍劲，盘根错节，但到每年春夏，仍然枝叶繁茂，郁郁葱葱，一派生机，它将和贺龙同志的英灵一样，永远扎根在黔江四十万各族人民的心中。

红军活捉莫耀堂

杨　跃

马喇湖，今马喇乡政府所在地，解放前是酉阳县鹅湖乡。这里住着一家土豪劣绅莫耀堂。

莫耀堂，排行第二，生于清光绪八年，武举人出身，历任联保主任、乡长等伪职。其父莫祖普，贪财如命，是个守财奴；其儿子莫易州，袍哥舵把子；其侄莫银州也任过联保主任。

在三十年代初，莫耀堂就霸占良田沃土达二千四百多挑，各种枪六、七十支，除家眷二十余人外，还有长工和持枪家丁二十多人。莫耀堂及其侄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1933年12月，贺龙率领红三军打进了黔江县城，开展打富济贫的消息传到了马喇湖，吓得莫耀堂坐卧不安。一方面他大量购买枪弹，增加持枪护院的家丁，妄图与红军对抗。一方面将家中的贵重物资——银元、布匹、粮食等搬到他家附近的一个大山洞（即车子洞）内，并派人住洞看守。

1934年4月1日（农历甲戌年二月二十二日，清明节），是莫耀堂之女许婚“插大香”的日子。其亲家是白土乡土豪陈仲彬，媒人是寨子乡土豪周湘岩，高高兴兴地带着新女婿过门相亲。莫家请了厨师大办酒席。4日晚，有人报信，说红军到了兴隆坪（属酉阳县），莫耀堂说，啥子红军，日妈周矮子（即湘军旅长周燮卿）的部队垮下来了。莫

祖普说，兴隆坪隔我们这里百多两百里路，大家不要怕。5日早上，有人来说红军到了马喇街上啦！莫祖普认为报信人说谎，想讨杯喜酒吃，就气冲冲地说："昨晚说在兴隆坪，现在你说到了街上，那么快，天上掉下来的！"这时客人正在吃早饭，他又对报信人说："你想来吃顿饭吗，等下去吃嘛！"莫耀堂及陈仲彬、周湘岩等人，因夜间烧大烟睡得晚，还未起床。没隔多久，第三次来报信的人刚到，门口也来了一些穿便衣的持枪人，他们就是红军。红军要进院坝，莫家家丁不许，一名家丁放了一枪，接着莫家周围就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红军一拥而进。陈仲彬、周湘岩当即被擒，莫耀堂从后门逃出不远也被捉到了。莫家一些家丁边逃边放枪，红军也不远追。

莫家那时虽然在大办喜事，但莫祖普照旧穿件无外套的灰布长棉袍，红军打进院坝后，他从后门向山上跑，看见坡上有红军，就装着看田水的样子。红军问他是莫家的什么人？他说是莫家的长工被蒙混过去了。

红军在莫家抄出了大量的银元和其他物资，打开了莫家的粮仓，将粮食分给当地群众，并用包单将粮食包好，分别送到一些有顾虑的群众家里。

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打土豪，济穷人以及为民除害的故事，永远流传在民间。当时，有这么一首民谣：

马喇湖，大山下，万顷田，莫家霸；
莫耀堂，完蛋了，穷苦人，笑哈哈。

红三军攻打黔江县城的时间辨误

李代宣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同志曾经率领红三军攻占黔江县城。但是对于攻进县城的具体时间误传不少，在不少刊物、材料中也其说不一，为了弄清这个史实，不致以讹传讹，甚至给子孙后代造成麻烦，本文试作初步探讨辨析，并以此浅见就教于熟悉情况的同志和从事党史研究的工作者。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以致当时的革命大好形势急转直下。在这种错误的影响下，转战在湘鄂西的红三军，同样受到很大挫折，洪湖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遂于一九三三年初挺进到川边，打算在四川的黔江、彭水、酉阳、秀山一带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军入川第一仗，就是在四川黔江县与湖北咸丰县交界的大路坝打的，并在同一天攻进黔江县城。

红三军打进黔江县城的具体时间到底是何时呢？这里先摘引几段文字叙述：

一、《星火燎原》所载王绍南《黔东的春天》一文称："七师的一个团在红三军的先头去攻打四川的黔江县。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从距黔江城还有六十里的大路坝、中坝打起，边打边进。行程一百二十里，打了三仗，到傍晚的

时候打下黔江城，消灭了当地团防周化成部的一个团的兵力……我们只组织了一个鄂川边游击大队在那里活动（后来发展为鄂川边独立团），部队就撤离了黔江”。

二、《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红三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区根据地时期，国民党川军对红军的作战情况》一稿则说红军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将酉阳县城占领……红军到酉阳县城仅宿一夜，便直趋黔江”。酉阳县城离黔江县城234华里，至少得加劲走两天，也就是说二十五日出发，二十六日左右才能到达黔江。

三、湖北咸丰县编的一本“土家族简介”书上写道：“一九三三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红三军攻打黔江”。按公历推算则为一九三四年元月十二日。

四、一九五七年黔江县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报告材料中，记述粮商向必清说：“癸酉年（即1933年）冬月初六（公历12月22日）红军来时，中等大米卖十个铜元一升”。

看到这里，也许会感到无所适从，因有称红三军进城为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有说是二十二日的；有认为在二十六日左右的；也有写成在一九三四年元月十二日的。到底那个时间才是对的呢？我不妨再罗列几则本地群众的见闻：

据一九七六年“黔江县革命文物调查小组”、一九八〇年“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考察小组”和一九八二年“黔江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等几次的实地调查采访中，有不少人提供了当年红军攻打黔江县城的时间。如红三军入川打第一仗的地方大路坝，有一位66岁的杨秀珍说：“冬月初六（公历12月22日），红军来了，有的喊联英会拢了”；南海公社农科站77岁的丁竹山也讲：“红军路过大路坝是一九三三年

冬月初六”；离黔江县城不远的城北二队，有位71岁的向保成说：红军是“冬月初六由湖北活龙坪攻黔江的，下午五点左右，与黄团长部队接火，到黑攻进城”；县城内城河二队75岁的张兴育也说：“贺龙领导的一部分红军，进入黔江县城是癸酉年冬月初六日，住了七天”；城北公社川洞三队社员孙振华深有感慨地说：“红军进城好多年了，我就有好多岁。据父母讲，我是红军进城那天生，癸酉年冬月初六日”；县城内居民，烈属张文先的介绍，更令人信服，他说：“红军是癸酉年冬月初六下午（太阳只有一竹竿高了），由中坝打起来的。一路从大垭口，一路从桃子坝打进城。第二天大部队接着进城，在黔江县城住一个星期，冬月十三日晚上离开黔江城。我为什么记得清楚？我有一件贴心事，我父亲被国民党伪政府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已关三年，红军打进黔江城后，冬月初七日打开监门，放出被关的犯人，我父亲就是红军救出来的。所以这个时间，我是终身难忘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红三军攻打黔江县城的确切时间，应该为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于对红军在县城住营七天的史实没有什么异议，因此撤离黔江县城的日期便相应为十二月二十九日。

其理由是：不仅有众多的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回忆，时间均与此相吻合，尤其是孙振华、张文先的回忆和介绍说服力更强。因为从习惯上讲，一般说来，一个人的生日在头脑中的烙印是深刻的。再是，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而得到解脱的人来说，勿容置疑，本人乃至亲属都会对那获释的时间刻骨铭心。

《星火燎原》所载回忆录上的时间与实地调查采访的基本相符，仅仅稍前两天，而前面第二条所列，不仅时间不对，而且连红三军攻进黔江的方向也搞错了。事实上，红三军是从湖北咸丰县水坝出发，经大路坝然后攻黔江县城，而决不是从酉阳“直趋黔江”。至于第三条所述，时间相差二十一天，显然是某个环节有误。当然，原撰稿人一定是另有所据的。不过一九三四年红三军确实没攻打过黔江县城。虽然这年红三军多次到过县境其它一些地方，可时间也不在一月分，而是在四、五月间。

此外，我们从反面材料中也可得到一些印证。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伪政府的《川报》上刊了一篇题为《黔江共祸写真录》的文章，介绍黔江当时的县长殷鉴，向二十一军刘湘呈报的回任文中称：“窃职县前遭贺龙袭陷，业由郁山镇呈报在案。兹于本月三日，随军回城，照常供职，惟职府历任文卷概遭焚毁，片纸无存……监内人犯，完全纵释，并损失县前任移交保团图记，及职任总务科图记各一颗。其各机关法团暨城内外周围七八十里之殷实富绅，均被抄掳，无一幸免”。的确，红三军攻克黔江县城之前，人称“殷跛子”的伪县长殷鉴便随周化成部队仓惶逃窜，躲到了彭水郁山镇。红军撤离黔江后，他们于一九三四年元月三日返抵黔江县城。郁山镇距黔江县城也是一百五十华里之遥，当时既不通公路，而且山高坡陡，道路崎岖，非两日功夫也休想抵达黔江县城。红三军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撤离黔江后，消息传到郁山，殷跛子才随后从郁山出发至黔江。除去红军撤离黔江和殷跛子抵达黔江之日，其间刚好四天间隙时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